
一九四〇年日本对华和平工作

——“钱永铭工作”——

[日]藤井志津枝

日本的史学家秦郁彦,在其所著《日中战争史》(河出书房新社,157页)一书中指出,“钱永铭工作”,是重庆方面设计的谋略圈套。的确,“钱永铭工作”有许多疑点。特别是以日本外务省为主导的“钱永铭工作”,正好与重庆方面所设计的“宋子良工作”,与日本参谋本部的“桐工作”及树立汪兆铭南京政权工作的时间相互重叠。换言之,1939年末至1940年初,日中两国的和平工作,是围绕着建立汪兆铭政权的主轴而展开的错综复杂的谋略。日本方面的“诱和”谋略,是以达到软化蒋介石抗日立场为目的;而中国方面也以谋略的方式对应,以探求胜利之道。

一 西义显、张竞立互谋和平谍报

1939年末,部分日方人士对于“梅工作”的发展感到失望,而另行开辟了两条对重庆直接接触的和平路线——即参谋本部主导的“桐工作”和由西义显打头阵的“钱永铭工作”。汪兆铭的和平工作,原先的目标是在重庆与日本占领区之间树立第三势力,而藉此建立中间独立的缓冲地带政权,但因汪兆铭未获西南将领支持而宣告失败。不久,汪兆铭离开河内到上海后,结合褚民谊、傅式说及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等拥汪势力,决定将原本设置独立于日本占

领地区第三势力政权的和平工作构想,转变为在日本占领地成立中国中央政权。^①汪的构想,令日本参谋本部今井武夫大佐和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大失所望。今井等参谋本部的和平派,觉得汪兆铭无法解决日中战争,故另派遣铃木卓尔中佐至香港,展开对重庆直接和平工作。日本政府在2月21日,正式命名该和平工作为“桐工作”,并且上奏天皇。

另外,由于满铁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对于引出汪兆铭的“梅工作”变为日本陆军的特务谋略,和土肥原贤二的“要人离反工作”的一环,并使汪政权沦落为兴亚院在日本占领地内统治的傀儡机关感到不满,因而,西义显在1939年6月脱离该工作,另行摸索新的和平路线。^②但是西义显并非以一民间和平工作者身份进行,在他的背后有在中国拥有最大利权的满铁组织,特别是来自松冈洋右的鼎力支持。西义显的和平工作构想,与满铁在华中扩张利权,有密切关系。

西义显告别“被歪曲”的“梅工作”后所展开的新工作,自称为“第二期和平工作”。西义显认为,日本目前正处于欧战爆发、日中问题尚未解决,却又面临冒然加入世界大战的危机状态之中,日本政府企图依赖汪兆铭的“中央政权”,重辟中日新关系来解决日中战争,此乃一项愚不可及的行为,这种策略反而会造成远东地区并入世界大战的祸端。因此,西义显在承认日本政府对汪兆铭中央政府设置工作的同时,展开了以蒋政权为对手的“第二期和平工作”。^③

西义显选择张竞立充任“触媒”。张竞立与蒋介石年龄相仿又是同乡。他自一桥商业高校毕业后,进入大清银行,后任北京政府交通部平绥铁路局局长。1935年西义显在南京任职时,张竞立则

① 见藤井志津枝著《日本的对华和平工作》,台北文英堂,1993年版,第51—126页。

② 西义显:《悲剧的证人》,(东京文献会,1962年版),第266—70页。

③ 西义显:《悲剧的证人》,(东京文献会,1962年版),第313页。

是国民政府财政部司长,两人熟识且相互往来。西义显的计划,是企图透过张竞立在中国铁路方面的人际关系,来策动张公权,以达成直接对重庆政府,特别是对蒋介石的和平交涉。^①

西义显正企图策动张竞立时,中国方面也趁机要张竞立对西义显展开人情游说,以阻止日本建立汪兆铭的中央傀儡政权。此时,也正是中国的“宋子良”与日本参谋本部接触,企图瓦解汪政权的建立工作的时期。中国方面利用日本急于求和之心态,曾经拟定数条不同的谋略路线,试图瓦解汪兆铭政权的建立。张竞立11月中旬离开重庆到香港,随即到上海找西义显会面。后张竞立将会面一事交由盛沛东和沈恒处理,先行返港等待西义显到香港来。^②翌年元旦,西义显从广州前往香港会合盛沛东和沈恒,一同访问了张竞立。此时,西义显始知张竞立误解他仍旧从事“梅工作”,张的意图是要阻挠日本树立汪政权的工作。^③张竞立以中国“正统政权”的立场论述是非,并义正词严地劝告西义显应阻止汪组织伪政权。^④当时西义显心中另有打算,愿意与张竞立保持关系,而且张竞立也适时地说明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何以未参与汪阵营的原因,提及张发奎与云南省省主席龙云之弟卢汉将军,同为中国人的秘密结社“道社”之成员,并透露张竞立本人也是“道社”干部之一等内幕消息。西义显衡量汪兆铭力量之薄弱与中国秘密结社“道社”的实力后,反而对透过张竞立寻找和平工作的路线,产生极大信心。^⑤

然而,张竞立并未立即响应西义显的劝诱,亦不肯提出钱永铭其人。西义显在无法进一步了解内情的情况之下,仍旧不放弃任何诱和的机会,转而对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产生兴趣。张竞立承诺

① 《悲剧の证人》,第276、284—294页。

② 《悲剧の证人》,第275—78页。

③ 《悲剧の证人》,第279、282页。

④ 《悲剧の证人》,第280—84页。

⑤ 《悲剧の证人》,第282—84页。

替西义显联络张发奎,但这条路线没有下文,最后不了了之。^①此外,西义显在香港停留期间,曾经透过盛沛东的关系访问旧安福派要人李思浩,企图说服他参与和平工作。^②

1940年4月,西义显再到香港,和平工作仍旧没有任何进展,时间徒然流逝。^③当时,日本的参谋本部展开的“桐工作”,由于遭受重庆方面在3月利用“宋子良”所进行的延迟与阻拦汪兆铭“中央政府还都南京”的谋略工作而告失败。重庆方面在将陈公博等77人列为汉奸,发出缉捕令之后,将其所进行的谋略工作暂告一段落。于是,日本方面在树立汪政权以前,利用谋略方式期与重庆政府达成停战一和平的“事前合流”计划失败了。日本参谋本部“桐工作”成员,在蒋汪“事前合流”计划失败之后又以“事后合流”为目标,4月中旬重开铃木卓尔与“宋子良”的交涉。此时虽然日本方面已经约略察觉“宋子良”是冒名的蓝衣社成员,但仍旧相信这条诱和路线可以直通重庆,因而与“宋子良”继续进行交涉。

二 第二次近卫内阁松冈外相的诱和“原案”

4月,以“事后合流”为主要目标的“桐工作”,进行相当顺利。6月上旬在澳门举行了第二次预备会议。会中,重庆代表积极表明“反共讨共立场”与蒋介石对日和平的意愿。澳门会谈决定蒋介石、汪兆铭以及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三巨头举行“长沙会谈”。但是,“长沙会谈”因为中日双方对会谈的地点、时间、手续等事宜,无法达成共识而难以定案。由于当时德国在欧洲战场势如破竹的胜利,一时之间,日本国内出现“赶上巴士”的呼声,因此日本政府急欲结束日中战争,提出即使在条件上对中国有

① 《悲剧の证人》,第285—86页。

② 《悲剧の证人》,第286页。

③ 《悲剧の证人》,第304页。

所让步也要成功地举行“长沙会谈”，以求早日结束日中战争。于是，6月23日，它向铃木中佐下达“训令”，指示日方从和谈条件中剔除承认满洲国和驻兵两个条件。7月22日“宋子良”和铃木在香港会谈，决定中日在8月初举行“长沙板垣—蒋介石的停战会谈”。日军当时的态度是渴望及时停战；重庆方面则乘机施展拖延战术，屡次向日方提出难题，要求日本再作让步。在中国无意和谈的情况之下，7月31日铃木中佐宣告和谈失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8月10日、海军于9月10日相继确认“桐工作”失败。9月19日，御前会议讨论“三国同盟”时，日本政府决定“暂时终止”“桐工作”。10月8日，日本陆军依“大陆指第七五八号”指示，正式结束“桐工作”。^①

然而，西义显与张竞立的和平工作，经过半年多的观望期，却出现转机。7月初，西义显接获满铁上海事务所的通报，得知盛沛东密访东京的消息，因而西义显的和平工作再度复苏。^② 据闻，盛沛东之所以访日，是因为有“重要人物”即将自重庆到香港，所以张竞立为催促西义显再访香港而特别派遣盛沛东访日。盛沛东所说的“重要人物”，西义显说就是浙江财阀巨头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钱永铭在上海四一二事变时，向蒋介石提供军政资金，并协助发售“二五库券”，之后便成为蒋介石的少数友人之一。^③

当西义显重新开展和平工作之际，首先力邀儿玉季雄参与。儿玉是西义显交往20年的朋友，是使西义显加入满铁的关键人物。西义显还曾探问近卫第二次组阁的外相人选松冈洋右的意见。（7月16日米内光政内阁因反对三国同盟而遇陆军倒阁运动，继之组阁的是支持陆军新体制的近卫文麿。近卫组阁时，力排众议指名松

① 关于桐工作，请参照藤井志津枝前揭书的第三章，第127—175页。

② 《悲剧の证人》，第305页。

③ 《悲剧の证人》，第306--9页，《旧上海的金融界》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6--8页。

冈洋右为外相。)① 松冈外相到底给予西义显何等指示? 7月19日近卫组阁之前,曾经在获窪私宅会晤松冈外相、东条英机陆相、吉田善吾海相等人,举行四相会谈。当时,松冈提出《我方对支那事变与世界新形势拟定方案》(松冈原案)。从这个方案可以窥见松冈洋右对华诱和构想和世界战略的梗概。②

松冈主张,以强化日本经济活动,作为主要内外施策的基本方针。在此前提之下,他认为“我国的经济活动,必须重视战区作战部队的作战能力,故军方绝对有必要自行掌握其生存之权利”。至于其他方面则“一律由政府统筹领导,力求振作”。松冈此番话的目的,就是企图把对华和平交涉的主控权自军方收回,由外务省统一指挥。

《松冈原案》第三项目,乃是“支那事变的处理”。主要点为:(一)日本采取彻底作战及阻截援蒋势力措施的同时,在中国内部进行战略性施策,作为辅助手段。(二)日本政府援助汪兆铭南京政府的方针不变,但是重庆政府如有与日和谈的意愿,则重庆政府必须同意以下三点:1,具体实现东亚共同防卫计划;2,共同确立东亚经济圈;3,保证中日不开战。另外,中日停战后中国要重建新政权时,重庆方面必须向日本承诺尊重南京汪政府之意,并视南京汪政府为内政问题来妥善解决,否则中日无法达到停战或和谈的目的。

四相在获窪会商后,对《松冈原案》加以修正。在第三项“支那事变处理”中,再添加“禁止排日”与“排除共产主义”二条件。再者,停战后的新政府建立方面,日本要重庆尊重南京汪政府的立场不变,但在两政府妥善解决的有关“内政问题”用语,加上双引号,强调中国应尊重日方意见,建立“蒋汪合流”的新中央政权之意。另外,为促进松冈外相路线之和平工作,要求南京政府大力支援对重

① 酒井三郎《昭和研究会》,东京 TBSブリタニカ、1979年版第199页;冈义武:《近卫文麿》,东京岩波新书,1976年,第119页。

②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战争への道・开战外交史》别卷·资料编,东京朝日新闻社,1988年,第319页。

庆政府的和平策动。^①

关于对华和平策略方面,在四相获逞会议修正松冈原案后的“决议”中,找不到任何的让步项目,与进行“桐工作”时日本陆军中央曾经愿意让步的情况不同。可见,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基本上并无改变,始终以战胜国姿态提出要求。

7月27日,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中制定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要纲》。要纲中放弃过去一直为解决中日战争所施展的对华政策的努力,改行新的“南方施策”,企图截断英美等国对蒋援助的途径,断绝重庆政府的生命线,达到使重庆政府屈服的目的。至于西义显的活动,只要背后有第二任近卫内阁外相松冈此一“政治势力”存在,西义显也就无法推脱其和平工作所背负的国家主义色彩。换言之,日本政府决定对华政策重点是阻截英美援蒋,而将诱和策略视为其“辅助手段”,故同时推进诱和工作与树立汪政权的工作。因而,无论西义显在回忆录中如何强调其和平工作乃是出自于个人一片赤诚,也很难自圆其说。毕竟,他不过是外务省松冈洋右相对华外交“谋略”中的一个棋子而已。

三 “钱永铭工作”的开始

应盛沛东的邀请,匆匆前往香港的西义显,在8月24日会见钱永铭。双方在香港九龙钱宅,于27日进行第四次会谈时,钱永铭终于允诺参与和平工作。西义显在回忆录中记载,钱永铭当时提出三项和平条件:

- (一)合并重庆、南京政府,以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全国统一政府。
- (二)日本政府以中国新统一政府为谈判对手。日本自中国全面撤出为中日战争所派出的所有兵力,关于实施撤兵的具体技术条件,首先参照两国缔结的停战协定办理。

① 《太平洋戦争への道・开战外交史》,第319—320页。

(三)日本政府与新中国政府缔结防守同盟,但得排除特定国于同盟对象之外。^①

所谓的“特定国”,根据西义显的说明是指美国。再者,关于第一项条件,钱永铭对西义显解释说,汪兆铭之事乃是中国内政问题,日本毋需插手。^②然对日本来说,把汪政权作为“内政问题”处理一事,也刚好合乎日本排除欧美干涉的意图。

钱永铭为确认日本政府的和平意愿,决定派遣张竞立为正代表、盛沛东为副代表赴日。8月31日张、盛随西义显和儿玉季雄,搭船离开香港。航行约二周后,西、张、盛三人中途于上海下船,儿玉一人独自返日。据西义显说,张、盛二人为取得出国签证而在上海下船,实际上西是为了获得汪兆铭之事前谅解,因而将张、盛留置上海等候,只身前往南京。^③西义显此举与前述四相获淫会议中,为增进和重庆间图谋和平的机会,而策动南京政府的“决议”^④不谋而合。西虽藉口说是为获得汪兆铭与周佛海谅解而前往南京会面^⑤,但是实际上是为其和平工作镀金,以便说服松冈。西义显前往南京取得周佛海的二件文书,一是以南京政府的立场,允准由钱永铭与重庆政府交涉之委托书,一是致松冈推荐张竞立之介绍书。^⑥其后西一行人于上海江湾机场离境至福冈雁巢机场,后搭火车前往东京,抵达时大约是9月17日傍晚。西将张竞立安置于帝国饭店,随即奔赴选千驮谷外相的私邸,详细说明工作的始末。

根据上述西义显回忆录中所言,当时留在上海的张竞立等人,对西前往南京一事,全不知情,也未与南京政府当局接触。实则不然。周佛海并不完全信任西义显,他自行前往上海与张竞立等人会面,在9月9日至15日(除去13、14两日)连日会商,最后决议派

① 《悲剧の证人》,第338—9页。

② 《悲剧の证人》,第343页。

③ 《悲剧の证人》,第338—343页。

④ 《太平洋战争への道・开战外交史》,别卷,第319页。

⑤ 《悲剧の证人》,第344—5页。

⑥ 《悲剧の证人》,第346页。

张竞立赴日。

根据《周佛海日记》9月6日的记载：“(下午)五点，偕(陈)公博谒见汪先生，承汪先生告以西(义显)赴港与钱永铭接洽经过。据云：钱表示，宁渝合作，渠可负责促成，并谓周作民可代表渠与我方接洽，再行赴日等语。西之言是否可靠，拟俟余赴沪晤西同见钱之张竞立谈，然后再为处置。”^①可见周佛海一开始即对西义显抱持怀疑。周翌(7)日的日记上记载：“7时起，西来谈。旋与西及影佐(桢昭)谒汪先生，商与钱联络。影佐意，关于停战，既有宋子良与今井接洽，不管其可靠与否，但于其确实失败之前，无论日本及我方，似均可任其接洽，不宜与之争做，故吾辈今天只与钱谈宁渝合作及和平条件问题。汪先生甚以为然。”^②由此可见，西义显在进行“钱永铭工作”前，不仅需要获得汪兆铭的同意，更重要的是与日军“梅工作”的负责人达成协议。于是周佛海会见钱永铭之代表并谋求双方达成协议细目，决定于8日前往上海。

9月9日张竞立会同西义显访晤周佛海，向周佛海说明钱永铭系为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并促成重庆—南京合作而竭尽全力，三人会谈并涉及“宋子良”—今井的交涉事项。周佛海在日记中说：“余对此事本断定其不成功，因日方由渝方所得文件，均非正确。”^③是夜，西、张、盛等“钱永铭和平工作群”与影佐桢昭、周作民会谈。翌日下午，周佛海与影佐桢昭谈及有关“宋子良工作”情形，知道该工作目前由于重庆方面指责近卫致蒋介石的亲笔函内容空洞，蒋介石有可能拒绝回信。他认为：“此事余始终认为日方为渝方面所戏弄，恐难成功也。”^④随后周佛海会见李北涛，请李回香港劝请钱永铭为和平工作奔走，同时向钱详细说明日本的政情及南京

① 蔡德金编：《周佛海日记》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67页。

② 《周佛海日记》，第367—8页。

③ 《周佛海日记》，第368—9页。

④ 《周佛海日记》，第369页。

政府方面的态度。^①李北涛为交通银行总行的秘书,是钱永铭的部下。周佛海在当天(9月19日)的日记中透露内心的无奈:“连日为全面和平努力,希望能有成就,但实际困难甚多,不易成功,奈何。”^②

9月17日夜,张竞立、盛沛东抵达东京住进帝国饭店后,西义显即前去拜访松冈外相,向松冈报告张竞立访日的经过,并提交周佛海代替汪兆铭写给致日本外相的亲笔信函,而极力说服松冈。西义显的劝说奏效,松冈向西表示他明日将赴叶山觐见天皇,因此命令西备妥有关钱永铭与“道社”的上奏稿。^③西义显即于翌日下午引领张竞立、盛沛东前往外相官邸拜访。西向松冈交付上奏稿,张则提出钱永铭的和平条件。^④然而,当时的松冈表现相当怪异,会谈中并未给予中国方面代表发言的机会,也回避钱永铭的和平条件,因此张竞立无法得知松冈的真正意向。当时松冈基于三国同盟的立场赌注日本未来的国运,不愿让中国方面得知日本真正的用意。因此,松冈在18日第一次会谈后,就将张竞立等人送往箱根,让儿玉季雄陪伴到处游山玩水。^⑤然而,西义显则在这期间奉松冈之命,在帝国饭店待命,以备随时接受传呼应讯。^⑥第二次松冈与张竞立会谈,是等10月1日海陆外三相达成“对重庆交涉和平事项”决议后,始于次日进行的。松冈外相告知张竞立,他已于钱永铭中介条件书上署名,并无条件地信任钱永铭。^⑦但是,松冈向西义显要求,该和平工作必须在二个星期之内,亦即10月30日之前完成。西和张竞立一行,搭乘参谋本部的特别运输机离日。^⑧

① 《周佛海日记》,第369页。

② 《周佛海日记》,第369页。

③ 《悲剧の证人》,第349页。

④ 《悲剧の证人》,第350—2页。

⑤ 《悲剧の证人》,第352—5页。

⑥ 《悲剧の证人》,第355页。

⑦ 《悲剧の证人》,第362页。

⑧ 《悲剧の证人》,第362页。

四 提升为日本外务省和平工作的“钱永铭工作”

从10月1日陆海外三相会议中所决定的《对重庆交涉和平工作事项》和附件《第一项日本方面要求条件试案》，可以了解日本对于“钱永铭工作”的谋略方针。

《对重庆交涉和平事项》的第一项，表明日本与重庆之间的和平交涉必须依照日本与南京政府之间所达成的基本条约(包括海南岛的相关秘密协定)为基准，并且在“附件”中列有下列五项要求，具体说明日本方面的立场：

(一)承认满洲国(但视情形采其他途径达成协议亦可)。

(二)放弃抗日政策，中日共同防卫东亚。

(三)基于共同防卫东亚，承认日本在华驻军。

①派遣军队驻屯蒙古、新疆及华北三省，以确保共同防共。

②承认船舰部队驻留海南岛及华南沿海特定地区，以确保中国沿海航行的安全。

(四)承认日本为国防上的需要，在中国从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五)承认长江下游三角地带的有限期驻军(但视情况取舍)。

除以上五条件外，另外在“附件”中，以“注记”列举三个必须要“实际贯彻”的项目：

(一)谈汪兆铭及蒋介石两政权合作时，必须尊重日本的立场，并视其合作为内政问题处理。

(二)具体实现中日两国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日本是基于平等原则，在形式上尽力尊重且维护中国的尊严。

(三)关于调整经济现状，必须深思熟虑，以避免中日双方经济均陷入混乱。^①

① 《太平洋戦争への道・开战外交史》，别卷，第302—3页。

《对重庆交涉和平事项》第二项规定,日本与重庆之间的和谈,是以实施“蒋汪合作”和日本—重庆直接交涉为原则,且本项交涉必须于10月获得实效。若于10月份无法达成目标,即把重点移转至对德苏的施策上,并按照预定计划,日本正式承认汪兆铭政府。可见日本展开“钱永铭工作”时,曾考虑过打“德国牌”,以从旁配合和谈,或藉由调整对苏国交,以达牵制重庆的目的。但是,就如同下面将会提到的,日本早已有意暂时以“钱永铭工作”作为直接对重庆谋略的最后和平工作,并决心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9月27日)来对抗英美,朝向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路迈进。

日本外务省之所以会立即同意西义显以钱永铭为中介直接对重庆进行和平工作,是因为外务省东亚局第一课长太田一郎在9月5日就已提出对重庆直接和平工作的构想,其中并考虑过藉由周作民、钱永铭、张秀鸾及头山满来进行的可行性。太田案比10月1日修正《松冈原案》的获窪四相会议“决议”,条件较为宽松,许多妥协施策项目,均列入和平条件之中。特别是有不强求蒋介石下台一项。再者,太田案虽未明列中日停战及日军撤退事项,却将中国暂时分割为国、共、汪三地区,以确立一般治安为优先,算是日方对重庆政府的妥协事项。^①但是,从10月1日修正《松冈原案》的获窪四相会议“决议”内容来看,日本绝对无意让步。可见“钱永铭工作”,只不过是外务省代替军部对重庆施展的另一个和平谋略罢了。

在这种日本政府拟定强硬措施的情况之下,和平掮客西义显的任务,如同他在“梅工作”初期负责引诱高宗武,成功后再由参谋本部影佐祯昭交接一样,此次开辟对重庆的直接诱和工作,他的任务也仅限于说服钱永铭担任掮客角色,其后把钱永铭工作委由外务大臣派遣的正式代表接手进行正式交涉。这一次外务省派遣前

①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戦争への道》第四卷·中日战争(下)、东京朝日新闻社,1963年,第239—240页。

香港领事田尻爱义为正式代表,他曾经参与“梅工作”,在香港待命,以备庇护汪兆铭。这次他以驻华(南京汪政府)大使馆参事官的身份担任外相的正式代表前往香港。^①另外,为加强对钱永铭的说服工作,前上海总领事、曾在卢沟桥事变时接受外务省指令,在上海展开对华和平工作的钱永铭旧友船津辰一郎也一道参加。^②同盟通信社松本重治,是为了说服周作民也加入钱工作群。^③周作民是浙江财阀系统金城银行董事长,当时他仍居住在上海的法租界内。

日本政府开始于着手“桐工作”展开对重庆直接和谈之际,便对承认南京汪政权采取随意性推延政策,以图引诱蒋介石。开展“钱永铭工作”时也是如此。在日本进行“钱永铭工作”时,南京当局同样面临充作诱饵的命运。另外,对重庆直接交涉的“桐工作”已宣告失败,日本应该了解重庆无意与日本协议和平。周佛海对日本政府再次图谋对重庆的和平工作,而一再拖延承认汪兆铭政权一事,深感不满。周佛海在10月2日听说影佐祯昭、日高信六郎次日将回国,乃托他们向日本政府转达强化对南京政府援助之意。^④10月13日,他还委托将返日的清水书记官,带回致松冈外相的书信,表示:“张竞立工作只能做全面和平之准备,万不可因此变更既定步骤。”^⑤周佛海对日本的不满,可以说是多方面的。早在7月19日,周佛海听到松冈即将就任外相的消息时,就说:“那个人言大而夸,未知近卫何以选渠也?”^⑥周佛海曾向影佐祯昭等日本人,对日本政府不肯承认南京政府表示个人的不满,并认为,无法实现和平的责任应由将南京政府贬为傀儡的日本来负。例如8月

① 《悲剧の证人》第361页。

② 《悲剧の证人》第362页。

③ 《悲剧の证人》第365页。

④ 《周佛海日记》上卷,第384页。

⑤ 《周佛海日记》上卷,第391页。

⑥ 《周佛海日记》上卷,第340页。

28日交涉“日华基本条约”的当天,在近卫声明中就载有“日支满蒙”四个字,周佛海加以批评说:“承认满洲国,已万分忍痛,如将蒙古又成一国,实非吾人所能忍受。”^①

10月16日,影佐祯昭会同陈公博和周佛海会见汪兆铭。影佐向汪表示日方正与重庆交涉和谈,因此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日期多少会延迟。西义显、张竞立与盛沛东一行人,在日本整整停留一个月之后,当天下午随同松本重治抵达南京。周佛海和西义显一行三人会谈三个小时后,周佛海答应尽力全面协助“钱永铭工作”,但仍提醒他们,强调重庆方面并无和谈意愿,以及蒋汪合作的关键仍在于重庆等。西义显则请周佛海敦促周作民同赴香港,协助和谈工作。是夜,周佛海、陈公博与汪兆铭商谈后,决定派周佛海、陈公博二人同去上海^②,说服周作民与西义显等人共赴香港,并要求周作民代表南京政府,会同钱永铭前往重庆,劝说重庆与日和谈。结果,周作民应允香港之行,但直言,成功的机会渺茫。^③

在香港方面,二个多月以来一直等待张竞立赴日消息的钱永铭,早已失却充当中日和谈媒介的意愿。由于日本在1940年9月底缔结三国同盟,以及西义显不与钱永铭商谈却迳赴南京与周佛海等汪方人士接触,再加上与访日的张竞立失去联络等诸多原因,致使在香港的钱永铭相当不悦。西义显动员所有新加入和谈者,如周作民、船津辰一郎等人,促请钱永铭出面帮忙。根据西义显的记载,劝说奏效,钱永铭于11月2日决定派遣使者前往重庆。此使者将携带钱永铭呈蒋介石亲笔函,松冈外相签名有关承诺由钱永铭担任和平中介者的文书,以及周作民委托张群劝说蒋介石的信函,和向吴鼎昌请求协助的书信。^④周作民的书信是经周佛海同意,由松本重治拟成的,其中有日军一年内退兵的条件。

① 《周佛海日记》上卷,第362页。

② 《周佛海日记》上卷,第392页。

③ 《周佛海日记》上卷,第394页。

④ 《悲剧の证人》,第368—371页。

五 “钱永铭工作”是重庆方面的谋略？

“钱永铭工作”一开始，汪兆铭方面的立场就极为微妙。它一方面必须协助推展“钱永铭工作”，一方面又必须坚守立场，以确保其政权的巩固。周佛海于10月18日与松本重治会谈后，在日记中透露了这种矛盾心理。当天，松本重治在讨论日华基本条约及承认汪兆铭政府的问题时，表示“最好先承认，后签约”。周佛海也赞同松本的意见，说：“余谓此为合理之办法，余前亦有此议，未蒙通过。大约日方以谈判条约延迟承认，以待重庆之全面和平”。^①他又想到“桐工作”时南京所背的负担，接着说：“余等亦明知此意，但因希望全面和平心切，故照日方提议步骤进行。”^②这透露了他不得不再度全面协助“钱永铭工作”时的矛盾心态。

对“钱永铭工作”不抱任何希望的人，不仅有周佛海，还有参谋本部的“桐工作”人员，以及一直推动设立南京政府的“梅工作”成员。他们不再参与“钱永铭工作”，而致力推动正式承认南京政府。10月27日周佛海日记记述：“日高参事官来谈东京近情，并谓日方望汪先生为正式首席，不必代理。”^③是夜，周佛海即与陈公博谈论此事，决定于总理纪念日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委员会，修正国府组织法及推选主席等事宜。陈公博一直赞成汪兆铭就任国府主席，周也说：“余本不赞成，以留宁渝合作余地。今重庆既无意言和，原改组派同志及友邦都主张甚力，余无力阻止矣。”^④

然而，日本政府当局为配合在香港进行的“钱永铭工作”，又想取消前次对南京政权的口头承诺。11月6日犬养健访周佛海，谈

① 《周佛海日记》上卷，第393页。

② 《周佛海日记》上卷，第393页。

③ 《周佛海日记》上卷，第398页。

④ 《周佛海日记》上卷，第398页。

论香港的消息,说:“钱新之、周作民均未赴渝,只派人将方案送去。”^①周佛海说:“余处日前亦得此消息,惟未知所派者是否杜月笙也。”^②周佛海是根据钱永铭与杜月笙和蒋介石的密切关系,推测使者应该是杜月笙。钱永铭与杜月笙,是上海黑白两道的代表人物。钱、杜两人关系非常密切,杜月笙之得以设立中汇银行,跻身银行和实业界,是经钱永铭的指点。^③此二人均曾在蒋介石北伐进驻上海之际,协助蒋反共,对培养蒋在上海一带的势力有极大贡献。卢沟桥事变后,两人前往香港居住,而杜月笙在香港以蒋介石个人驻港代表之身份,参与机密工作。例如,在1940年初,高宗武和陶希圣脱离汪兆铭阵营及暴露日汪密约事件,与杜月笙的从中劝告和活动有极大的关系。后高宗武赴美时,杜月笙奉蒋介石之命给高宗武5万美元。^④因此可以说,杜月笙和钱永铭皆与蒋介石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周佛海猜测使者若是杜月笙,那么这条和平交涉路线即具高度可行性。

当天,犬养健又向周佛海说明:“东京友人对渝尚存若干希望,盼12日暂缓推举主席。”^⑤犬养本人虽然反对日方这个决定,但也无可奈何。周佛海回答说:“此事余自始即不赞成,延期亦未始不可也。”于是9日周佛海随同陈公博会见汪兆铭,传达日本有意暂时中止汪就任主席的决定,并决定在尚未与日正式签字以前,以南京汪政府的立场打电报给重庆政府,作最后一次的和平劝告尝试。^⑥汪兆铭原本打算在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卸除代理主席正式就任主席。根据西义显回忆录,他在港从同盟通信得知此事后,打电报给松冈外相,展开反对汪就任主席的运动。从西义显推

① 《周佛海日记》上卷,第403—4页。

② 《周佛海日记》上卷,第403—4页。

③ 徐成:《杜月笙正传》,北京当代人物出版社,1981年,第56—7页。

④ 徐成:《杜月笙正传》,北京当代人物出版社,1981年,第103—110页。

⑤ 《周佛海日记》上卷,第404页。

⑥ 《周佛海日记》上卷,第404—5页。

动“钱永铭工作”的角度来看,汪未就任主席是好事,催促钱永铭向重庆展开第二次劝告的动机,是值得肯定的。^①果然,据说在11月12日,由张群代笔的蒋函终于送达香港的钱永铭处。西义显记载该书信内容是:“向东京权责当局发函,特别是对松冈外相之诚意,甚感钦佩。”^②于是,西义显对“钱永铭工作”,愈加有信心了。

对周佛海来说,好不容易才结束“桐工作”,如今又面临承认汪兆铭南京政府工作与“钱永铭工作”竞争的困境。周佛海内心的忧虑,也正是负责“梅工作”的影佐最担心的事。11月14日影佐祯昭访问周佛海时表示,为催促东京当局承认汪兆铭政权,以及强化中央银行,他打算陪伴周佛海访日。^③然而,周佛海访日之前,最感兴趣的,却是收集有关“钱永铭‘诱和’工作”方面的情报。

11月18日—25日间周佛海在东京展开活动,拜会近卫首相、东条陆相、河田烈藏相等日本政府负责人,并与曾参与“梅工作”的故友欢聚,但是周佛海最关心的,不外乎是收集有关“钱永铭工作”的情报。22日深夜,周佛海与影佐交换情报。周日记载:“影佐来,谓渝方于十八日派员到港晤钱永铭,表示日方不可承认国府;钱于19日晚,访田尻,故松冈接田尻电后,信渝方有和意,拟延期承认;渠与阿部(信行大使)力争。余告以钱致蒋缄,五日即送到,直至周作民离港,尚未回信,18日忽派人来港,定悉知余来日策动承认,故以此破坏,盖上海15日晚报即载余来日也。影佐甚以为然。询以所派何人,渠亦不知。”^④可见21日田尻电,对日本决策当局起了直接的作用。而这对周佛海来说,在承认南京政府问题上,又再度遭受阻碍。

周佛海经21日深夜与日本外务省详谈,并从中收集日方所进行有关“钱永铭工作”的情报之后,于22日他以肯定的语气说:“钱

① 《悲剧の证人》,第375页。

② 《悲剧の证人》,第371—2页。

③ 《周佛海日记》上卷,第408页。

④ 《周佛海日记》上卷,第413页。

永铭工作”是重庆方面藉机向日施展阴谋瓦解南京政府的“破坏”活动。

23日,周佛海从昔日“桐工作”日本方面代表之一的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大佐处,获悉周作民尚未回到上海,且田尻发的电报叙述情况相当乐观等有关“钱永铭工作”的消息。但是,周佛海持怀疑态度,认为日本对中国不够理解,情报也多半不正确,无法全然信任日本人,认为“臼井所谈,恐仍系空中楼阁也”。^①果然,24日下午,周佛海接到陈公博拍来的电报,得知周作民早在19日就已经回到上海,在17日他离开香港时并未收到重庆方面的回函。于是,周佛海肯定地说:“18日派人到港之说,恐亦如周末返沪之情报同样之不确实。”^②他断定日方所获情报都属错误的。周随即向影佐显示陈公博函电内容,并在下午三点,两人一同前往深望卧病在床的松冈,向松冈说明南京方面致力于全面和平的经过,以及重庆方面无意和谈的原因。松冈向周佛海说明支持汪方的经过,并承诺御前会议召开时力主30日签约,但他不忘附加条件,即如果外务省获知重庆方面有意和谈时,将与汪兆铭商议延期签约。周佛海当场向松冈表示赞成,但仍旧不忘向日方表示担心“惟恐中重庆拖延之计”。^③周佛海以婉转的语气向松冈暗示,外相一厢情愿进行的“钱永铭工作”,结局终究无法逃脱“中计”的命运。

11月25日,周佛海回到上海,当夜即与周作民见面。原来松冈、钱、周作民给蒋介石的书信,并非如日本方面所传言是由重庆的要人亲呈蒋介石,而是转托有事停留在香港的金城银行重庆分行经理戴自牧携回重庆,并非由钱、周面呈蒋介石的。而且钱永铭对此事没有兴趣,周作民原本也打算尽快返回上海,但为船津所挽留。周佛海在日记中流露此刻沦落为“汉奸”,内心懊悔不已的心

① 《周佛海日记》上卷,第413—4页。

② 《周佛海日记》上卷,第414页。

③ 《周佛海日记》上卷,第414页。

情。他写道“足见日方前此所传,均与事实不符。日方如此认识不足,又何怪发生此次事件,即今后合作,恐因此亦不易顺利。”周佛海听取周作民报告,完全知晓“钱永铭工作”真相之后,立刻通知犬养健,叫他迅速打电报给日本的影佐传达消息。同时,他与汪方人士商谈,无论如何坚持改组南京政府,使汪兆铭早日就任主席,并决定向日方提出严正要求,早日正式承认汪政府。^①

六 三国同盟和“钱永铭工作”的失败

尽管西义显对“钱永铭工作”信心十足,然而最终不出预料败了。

钱永铭工作”在1940年秋天发端之际,适逢日本内阁决定与德、意缔结三国同盟。三国同盟,过去在近卫(第一次)、平沼、米内三届内阁中一直悬而未决,然到了第二次近卫内阁时,松冈接外相后,才顺利定案。松冈认为,三国同盟有助于阻止美国参战、对日本至为有利。这种对美强硬态度,迫使基于物资考虑坚拒对美开战的吉田海相辞职。^②9月9、10日,松冈一斯塔玛非正式会谈中,德国代表游说日本加入三国同盟,松冈也认为日本加入同盟对今后发展南进极为有利,进而双方达成协议。日本内阁在14及19日召开会议,多数阁员无奈地表示,“或许支那事变能因此而解决吧”。^③日本的领导阶层几乎都以消极的态度面对此事。惟有松冈外相当乐观,他企图在三国结成同盟后拉拢苏俄,认为以日德意苏四国合作将有利于日本的对华政策,并可自德国获得一半的石油,稍缓和日本最为匮乏的石油供给问题。^④

三国同盟于1940年9月27日缔结。当时,一般均认为三国同

① 《周佛海日记》上卷,第414—5页。

② 《太平洋戦争への道・开战外交史》,别卷,第334页。

③ 《太平洋戦争への道・开战外交史》,别卷,第333页。

④ 《太平洋戦争への道・开战外交史》,别卷,第334—5、338—9页。

盟不利于中日和平工作的推行。^①在缔结三国同盟的同一天,应参谋本部門松正一少佐邀请前来东京,与武藤军务局长会谈的胡蓉(蓝衣社政治部情报主任胡永荃)等人,一听到日本方面的和平条件,立即收拾行囊返国,从此断绝联系。^②甚至连西义显也说,缔结三国同盟是松冈外交的一大缺失。^③“桐工作”当事者与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认为西义显谋求直接对重庆和平工作,绝不可能实现,因而拒绝协助。今井武夫则认为由日本外务省着手的,中国金融界名流参与的“钱永铭工作”是可取的,“如果日本方面在条件作大幅度的让步,那么,从目前重庆内部的情势来看,和平工作有成功的希望”。但今井把三国同盟列入负面条件之首,认为三国同盟对和平工作有决定性的阻碍力。对于松冈对日本内部的和平条件不作任何调整,就冒然与重庆接触,而且还有“以三国同盟为对重庆工作的起点”,来一举解决问题的想法,今井也认为不妥当。同时,今井认为日本刚结束“桐工作”,就马上展开新的和平工作,在时间上也不恰当。^④

如同周佛海先前所预料的,重庆方面在周佛海 11 月 18 日访日时,派遣使者到香港,以“钱永铭工作”来阻止日本对汪兆铭政权的正式承认。然而,重庆方面蓄意回避与前来香港的南京政府代表周作民接触。因此,根据西义显回忆录记载,周作民于 11 月 17 日离开香港之后,重庆的使者始抵达香港。17 日,“不透露姓名的重要人物”抵港,深夜 11 点,西、儿玉二人被召至九龙的联络所与张竞立、盛沛东会面,听取重庆方面所提出的二项和平条件。于是,西和田尻爱义、总领事的密码译电员连夜译发,预定在 18 日上午电传到东京。^⑤

① 《昭和研究会》,第 185—9 页;《近卫文麿》,第 128—9 页。

② 《初期陆军作战(三):欧战爆发前后之对华和战》第 410 页。

③ 《悲剧的证人》,第 325、342 页。

④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73—4 页。

⑤ 《悲剧的证人》,第 376—380 页。

但是,根据近卫文磨所遗留的,上有“陆海两相昭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内阁完毕”注释字样的“钱永铭工作事宜田尻电”的电文,与西义显的记载略为不同。“十八日夜池田(西)会见木下(钱),接获重大消息”,“志贺(蒋介石)派遣代理人 L. C. P. (三九二)(陈布雷)来港,原则上承认安达(外相)所承诺的结婚(和平)法案,希望基于该法案尽速与樱(日本)协议结婚(和平),请将此事正式通告来港的安达(外相)派港代表秋山(田尻)”。又,“L. C. P. 预定 20 日前来香港,也有可能会有若干延期,但的确是前项旨趣而来。鉴于事情之重大,须通知樱(日本)”。^① 同一天的“和平工作近卫备忘录”记载:“19 日夜,陈(上将秘书)秘密来港,传达蒋言,委嘱钱代理蒋与日交涉。20 日夜,西会见钱与田尻。”^② 从以上内容看来,18 日钱永铭向日方预告,重庆将派出使者来港,正式与日和谈;20 日外相在港代表田尻爱义,会见蒋介石的代表钱永铭,得知重庆方面提出的二项和平“先决条件”,双方并当场展开具体的谈判。此二项和平“先决条件”,在 21 日电报告呈送给日本政府。究竟这位“不透露姓名的重要人物”,是在 17 日、18 日或 19 日抵港,并不重要。对重庆来说,只要日本方面对钱永铭所说的“消息”深信不疑,并向日本通知正式和平谈判开始,就可达到重庆谋略目的,即使这与重庆无关,而是钱永铭一人“虚构”捏造出来的独角戏也无妨,因为日方从头到尾直接与重庆方面接触的代表人物,只有钱永铭一人。而且,钱永铭在 20 日摇身一变,从原来扮演和平工作的“触媒”角色,突然间以“重庆代表”身份与日方外务省代表接触,并展开正式的谈判,难道这不叫钱永铭的独角戏?此外,关于“不透露姓名”使者的问题,西义显谓,后来才知道使者并非是陈布雷,而是张季鸾。^③ 但当时的张季鸾因有其他和平工作(兰工作),经常往来

① 《太平洋戦争への道・开战外交史》,别卷,第 303 页。

② 《太平洋戦争への道・开战外交史》,别卷,第 303 页。

③ 《悲剧の证人》,第 376 页。

于香港、重庆之间^①，因此似乎没有钱永铭所说重庆派遣使者的事实。难怪张竞立与钱永铭绝不透露使者的姓名，任凭西义显猜测。^②

根据近卫备忘录记载，中国方面提出的二项和平“先决条件”是：第一，“延期承认”汪政权，理由是“若日本承认南京政府则和平面临绝望，因中国视之为日本施压威胁”；第二，“撤兵”，说明“日军撤兵是形式上的前提，实质上以实施攻守同盟之名，让日军再行驻兵”。另以“附注”表明，“若承认此二点，蒋必亲自与日方代表会面，以表诚意，但蒋不是下关条约时的李（鸿章）”。^③ 这是指蒋介石不求和、不割让领土的意思。关于重庆所提的两项和平“先决条件”，根据西义显的记载，这是钱永铭“适当地释义”蒋介石的信函后所整理出来的和平二条件。看过蒋介石该备忘录的西义显说：“文书的措辞有如宣战布告文一般强烈，明列中日无法和谈的理由，且说凡促进与日本和谈者均视为汉奸，予以处置”，怎样看也找不出任何有意谈和的迹象。^④ 但钱永铭却以“适当释义”后的蒋函，向日方说明“蒋介石有意接受和谈”。当时，南京方面盛传，“重庆派出的使者并非大人物，而是个平常的小卒子，而此人所携带的蒋介石的备忘录，实为拒绝接受任何媒介的指令书”。西义显在回忆录中，谴责这种不利于和平工作的风传，是周佛海遣去的间谍李北东（李北涛）为破坏日本与重庆谈和所捏造的宣传活动。可见西义显不愿意承认亲眼看到的事实^⑤，宁愿相信钱永铭加以反倒过来释义的“虚构”。

在 20 日钱与西、田尻正式交涉时，钱永铭向日方提出两项“先

①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 151 页。

② 《悲剧的证人》，第 377 页。

③ 《太平洋戦争への道・开战外交史》，别卷，第 303 页。

④ 《悲剧的证人》，第 378—9 页。

⑤ 《悲剧的证人》，第 377 页。

决条件”，而日本方面也向钱永铭提出日方的条件。当日方想先确认“中国方面在原则上是否同意日本的原提案”时，钱永铭回答说：“蒋所提的合作层次，应超越法案范围”，“关于如何对待南京，重庆尊重日本的立场，但目前日本应对南京采取保密，且暂时故意让南京放出（钱永铭为媒介的）和平（工作）绝望的风声”；至于撤兵，钱永铭说中日应以攻守同盟的方式，缔结日华共同防共军事同盟，故其防守对象包括中国共产党。^①可见，谈判桌上的钱永铭，在此时刻试图阻止日本对汪兆铭政权的承认。当天钱、田尻双方交涉的结果，决定四大原则：（一）近卫三原则，（二）蒋汪合作，（三）全面撤兵，（四）防守同盟；其具体的施策共有五项：1，日方承认二项“先决条件”；2，以澳门停战协议为原则，继续展开和谈交涉；3，正式派出交涉员；4，应在12月5日前谈妥；5，如未能谈妥，则日方立即承认南京。^②田尻爱义结束这次与钱永铭的会谈后，在报告电文中表示“情况相当乐观”，因为“中国渴望和平”，简直就可以用“恨不得马上就成功”来形容。但田尻又在电文中说明，惟重庆方面对日本保守机密，怀有疑惧，唯恐“18日东京UP电文”之报导会直接外泄。^③所谓“18日的东京UP电文”报道，根据唐纵日记记载，应该是“16日”报导，指有关10日松冈对美驻日大使格鲁所说，日本现今正谋求与蒋介石直接交涉，请美国勿予干涉等的谈话内容。^④另一方面，重庆也就以第四项具体施策中所设定的时间为目标，亦即以12月5日作为对“钱永铭工作”反谋略的最后期限。

唐纵是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幕僚之一，他似乎是从16日东京UP电文报导中始知钱永铭工作的存在。在唐纵11月18日的日记中记载，“此事（松冈对美国大使之说明）或有可能。盖日本欲藉此以离间华美之接近，因美国此时诚恐中国对日本停战，故以此迟

① 《太平洋戦争への道・开战外交史》，别卷，第303页。

② 《太平洋戦争への道・开战外交史》，别卷，第303页。

③ 《太平洋戦争への道・开战外交史》，别卷，第303页。

④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75页。

延美国对华之援助。^①推测松冈的意图在于牵制美国。同时唐纵也预估在港进行的中日和平交涉不可能成功。唐纵如此判断是有所根据的,例如第二次近卫内阁中有东条、松冈、星野等关东军派人物入阁,即可察知内阁政策是“明里南进,暗中北进”。^②他又分析世界情势,特别是日本与越南、泰国的交涉情况,以及日苏、日德等关系。关于三国同盟,他说:“自日德意军事同盟宣布之后,美国之所反应者,贷款与我,今日又宣布撤退远东侨民(约一万六千余人)回国;英国之所反应者,10月18日再开滇缅路。现英美与日本的矛盾,日渐加甚,太平洋之战争,为期不远矣。据日本调查,美国许多军需品,均在研究代用品自给中,惟橡胶与锡尚无法解决,故荷印与南洋群岛,为日美斗争之焦点,现亦处于日美矛盾之分裂时期。”^③在苏联方面,他在10月15日的日记中分析说:“自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后,一时外交中心移至莫斯科,英美一德日各向苏联展开外交战。”^④唐纵又述及三国同盟后的日本对华和平交涉,说:“日人确欲言和,且能降低条件与我协商。惟须注意者,日人之企图,今日放低条件与我言和,待南进成功,英美退出太平洋之后,则将再向我压迫,如探囊取物。如我能利用其南进之时期,切实有所准备,作第二次之大战,则未始不可与言和,否则,应请考虑。”^⑤唐纵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分析,看穿日本当前施展和平攻势,乃是先对中国“诱和”,随后再逼迫“降和”之企图。

唐纵的分析,算是当时重庆政府的看法。因此,假使重庆方面运用如此微妙变化的国际关系,来策划所谓的钱永铭对日和平谋略,一点也不奇怪。据说,11月24日晨,重庆派来的使者突然离开

①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75页。

②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42页。

③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66页。

④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67页。

⑤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66页。

香港一事^①，就上述钱永铭全权负责对日交涉的过程来看，究竟是否真的发生，也有疑问。但这可解释为是重庆方面以 24 日撤回代表的方式，采取主动与日本断绝和平交涉的措施。然而执迷不悟的西义显认为，这是前一天(23 日)船津辰一郎对钱永铭所说的“即使松冈也不能变更御前会议所决定的方针”^② 这一句话所惹的祸。事实上，若从另一个客观事实来解释的话，可以视为中国不与日本继续谈和的主要关键，在于蒋介石的因应策略。蒋介石在“钱永铭工作”期间为顺利获得美国对华援助，必须表明中国反对三国同盟、投靠英美的态度，因此以撤回使者的方式来表示中国再也不与日本和谈。蒋介石亲信之一董显光战后所写的传记《蒋总统传》，其中提到“钱永铭工作”，他说：“但日本却继续派出和平试探者，以谋解决战争，甚至比诸较早被拒绝之时尤为恳切。彼时之外务大臣甚至派遣外务省之东亚局长来香港，欲与中国政府代表获致直接的交涉。”^③

当蒋介石被“外籍友人”问到有关日本对华和平攻势问题时答复说：“他们至少每月一次间接的及非正式的表达其求和之意；他们日益提出较优的条件，甚至表示愿从华北将日军撤退(引者注：此乃指“桐工作”条件之一)。但我方仍拒绝考虑此类提议。”^④ 可见，董显光虽然说“自从民国二十八年秋季以来，和谣常在散布。上海与香港为此种谣言宣传最盛之地；然其来源却与重庆绝无关系”。^⑤ 但这又证明了，蒋不但知道每一条日本对华和平工作路线存在的事实，甚至深入了解每回和平条件内容变化的细节与过程。“钱永铭工作”于 24 日突然“结束”，这当然与蒋的“决定”有密切的关系。董显光说：“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蒋总统达成一个重大意义

① 《悲剧の证人》，第 382 页。

② 《悲剧の证人》，第 382—3 页。

③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 年，第 321 页。

④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 年，第 322 页。

⑤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 年，第 321 页。

的决定。他决定中国与英美直接采取一致行动,以对抗轴心国的侵略。从此以后,中国对于日本企图与中国单独解决的一切和平条件,概置之不理。此一决定为蒋总统部下所有将领与顾问一致赞同,因为动摇分子绝迹于中国的陪都了。那时的标语便是‘民主国家必须共存共亡’。重庆当即宣布,国民政府直接拒绝商谈,甚至可以获得对日光荣和平的条件。”^① 蒋介石的“决定”,获得重庆陪都抗战阵营的共识,国民政府将此坚定的立场对外公布,以获广大中国民心的支持。“因为日本从来的和平攻势都是具有分化影响的”。^② 据说,蒋介石如此重要的“决定”,时间应该是在10月23日,亦即重庆获得美国国务院向蒋保证对华援助采取放宽限制的“备忘录”那一天^③以后的事。那么,可以绝对肯定地说,后期的“钱永铭工作”(1940年10—11月)纯属重庆方面对日本所施展的“谋略”,其目的不外乎利用该工作路线,试图再次阻止日本承认南京政府!此后,中国就成了美国的忠实盟友。

钱永铭一人所唱的独角戏——“钱永铭工作”,巧妙地反映了重庆对日政策的转变。因此,周佛海访日行程(11月18日—25日)一结束,18日到港的重庆使者就不等待日本的答复,立即于24日晨离开香港。西义显在回忆录中说道:“很遗憾的是,日本政府的回电,也在24日早上到达香港。松冈外相于23日以附带‘如重庆速派正式使者前来,日本政府即延期承认南京政府’为条件,早已说服日本政府承认重庆方面的条件。”^④ 西义显说,钱永铭又决定派杜月笙前往重庆,以求挽回之道。但杜月笙因25日遭受英国官方的阻挠,26日又无班机,因而延误至27日始飞离香港。杜月笙所携带的是钱永铭给蒋介石的二条建议,内容是重庆应派前驻日

①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第322—3页。

②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第322—3页。

③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第323页。

④ 《悲剧の证人》,第388页。

大使许世英为对日交涉首席代表,并赋予张竞立正式代表资格。^①但是以后联络就中断了。据说,田尻爱义接二连三地从香港拍电报请求日本中央政府延期承认南京政府,以等待重庆方面回应。^②但是,重庆这次施展反诱和的目的,就是以拖延到上述钱、田尻会谈时所设定的时间——12月5日为目标,故对田尻等日方谈判人员的焦虑毫不理会。

另外,南京政府方面,于11月26日经周佛海向汪等报告访日结果后,即当场开会决议:(一)于27日给予蒋介石最后劝和电报;(二)于28日召开中央政治委员会,29日召开立法院会议审查日华基本条约,为南京政府的正式成立着手最后部署。^③但这一次无法消除南京方面对日的不信任感。周佛海在27日的日记中记述:“本日枢密院会议已正式通过全部条约,因赴汪兆铭先生处报告。汪先生对就任主席,本日忽有踌躇之意,对于30日能否签约,亦颇怀疑,并决心就任。”^④随后周佛海在汪兆铭私宅与汪共进晚餐时,决定在明日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中通过汪兆铭就任主席,并亲订后天上午就职。28日,当周佛海获犬养健电,知道东京已确定于30日签约消息时,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大约重庆和平之说已证实为虚矣”。^⑤29日,周佛海获知影佐祯昭已到南京的消息时,才放心下来。

的确,日本方面所获“钱永铭工作”情报多半不实,尤其是来自西义显的消息,似是西义显在个人的期待与焦虑下所制造出来的产物。因而,钱永铭演的独角戏,始终未露出破绽。^⑥11月28日,日本政府新设的最高决策机关“连络恳亲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中

① 《悲剧の证人》,第389—392页。

② 《悲剧の证人》,第391—2页。

③ 《周佛海日记》上卷,第415页。

④ 《周佛海日记》上卷,第416页。

⑤ 《周佛海日记》上卷,第416页。

⑥ 《悲剧の证人》,第390页。

决议日本在 11 月 30 日正式承认汪兆铭政府,“即使重庆在十一月三十日前提议停战,亦不变更”。^① 11 月 30 日,周佛海参加日华基本条约正式签字仪式。当天他在日记中发抒感想,说:“过去努力,告一段落,今后另开一新纪元矣,惟此举是祸是福,人非上帝,未有能预言者。但是,最好汪蒋之间能有默契及了解,一参加日、德、意阵线,一参加英、美阵线,将来无论两阵线谁胜谁败,中国均有办法,否则双方均孤注一掷,实甚危险。”^②,这反映周佛海身为汉奸寻求自我解脱的微妙心境。是夜,周佛海阅毕来自犬养健的电报后谓:“田尻、船津等自港来电,深怪承认国府,至影响全面和平,岂重庆真有和平之意耶?”^③ 这证明周佛海对重庆无意与日和谈的判断,从头到尾正确无误。

七 结论

从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到 1940 年入冬之际,日本对重庆展开一系列的和谈攻势,最后以“钱永铭工作”作为结束。日本正是以摧毁重庆政府来结束战争的策略失败,反陷入中日战争泥潭无法自拔,因而以“南进”策略来寻找突破的时候,开展“钱永铭工作”的。当时的日本,舍弃自明治以来日英同盟的传统外交政策,决定加入反英美的日德意三国同盟,对英美开战。因此,日本拟定“钱永铭工作”策略时,对重庆所提的和平条件不愿做任何的调整,更是为了维护汪兆铭南京政府的立场,不愿意让步。日本的“钱永铭工作”,本质上是一种“谋略”,目的在于迫使重庆屈服。但是,“钱永铭工作”之始,一般日本当局人物即预测该工作终将失败。这由外务省及军部情报人员,对该项工作并未进行任何初步侦察,仅采取壁上

① 《太平洋战争への道・开战外交史》,别卷,第 352 页。

② 《周佛海日记》上卷,第 417 页。

③ 《周佛海日记》上卷,第 418 页。

观的态度,可以证明。故该诱和工作,是单凭松冈洋右与西义显二人倔强的个性及“信念”支撑,可以说基于无论采行何种手段,非将蒋介石诱引至谈判桌上不可的精神,予以推动的。此又是“钱永铭工作”中所包含的内在因素。

松冈外相与西义显在和平工作中所显示的如此过度的主观意志主义,反映了当时日本丧失主、客观判断的能力,急欲补充资源不足的疯狂想法。近卫首相明知三国同盟将不利于中日谈和,且日本根本没有对抗英美、发动战争的实力,却仍追随个性倔强的松冈。军部亦在三国同盟、“南进”策略决定后,盼望对华施策出现转机,对内更进一步迈向军人执政的军政之途。然而,这种日本国策决定中所显现的混乱与不负责任地追随“强者”的精神状况,正象征着军阀东条英机政权的成立,及日本法西斯时代来临的必然性。

日本“钱永铭工作”显示出对华理解不足,情报判断能力薄弱,过度崇信主观意志主义等缺陷,均给予中国方面利于施展“谋略”的机会。钱永铭、张竞立与盛沛东所组成的对日和平谍报群,仅显示出积极的回应态度,就能在日本外务省及日本决策机关造成一片混乱,因为真正急于直接谋和“恨不得马上成功”的,乃是日本的“钱永铭工作”者西义显个人,而非中国重庆当局。西义显对日本政府的决策本意了若指掌,但他与钱永铭交涉时,却故意另外拟出一个符合中国方面的条件,以达引诱中国应允和平的目的。钱永铭等人似乎熟悉日本方面所施展的骗术,故意作出适当的回应,以维持日方对他的信赖与期待,最后顺利完成其对日谋略的任务。

对中国来说,“钱永铭工作”是继“宋子良工作”后,中国在对日谋略战中再度获胜的例子。蒋介石从旁了解“钱永铭工作”,就有了确认日本必败的信心。日本发动南方作战,陷入更为艰难的“三面作战”的困境。这不仅使国际局势向中国有利的方向转变,还使英美采取强化对华援助、支持重庆政府的态度。反观日本,它实际已经没有余力在对抗苏俄、中国之外,再开南方战场。事实上,在中国本土进行的中日战争早已呈现泥泞般的对峙和僵持的状态。对重

庆政府来说,日本不再是造成主要威胁的敌人。蒋介石对中国现状之忧虑业已转向势力日渐扩大的中国共产党。因此,对中国方面而言,对日反和平谋略的“钱永铭工作”,已丧失其继续推展及其谋略上的重要性。

然而,日本方面结束“钱永铭工作”之后,仍然对和平工作抱着相当大的期望。甚至在太平洋战争最激烈的1942年,参谋本部还计划“设定以抑留支那人为主体的谍报工作”一案,力求动员“与南京政府关系不显露”的中国人士,针对蒋介石及其亲信展开谍报活动,进而逐渐转为招降性质的工作。根据现存昭和十七年三月八日,上海大本营总司令部研究成案的“对重庆谍报路线相关文件”之机密文书^①,日方在上海利用颜惠庆、周作民、李思浩、唐寿民、徐采丞等关系,对陈布雷、杜月笙、戴笠、朱家骅、董显光、吴铁城、王世杰、张鹤君、钱永铭、孙皋展开诱和活动。另外,日本设定“周佛海—钱永铭—张群”和“李士群—宋美龄、胡宗南、戴笠”的两条路线,以便加强和谈攻势。由此可以证明,在中日战争结束前,日方一直都没有彻底地了解“钱永铭工作”的真相和中国方面对于中日和平问题的真正态度,仍执意寻求各种可能的管道进行和平谋略工作。

(作者单位:台北中央政治大学)

① 《对重庆谍报谋略に関する件》,昭和十七年三月八日,上海大本营总司令部(文书),共20页。